

由《漂海錄》看明代中国人的社会思想

최창원(崔昌源)*

청운대학교 중국학과 교수(靑雲大學校 中國學科 教授)*

Viewing the Social Thought of Chinese People in Ming Dynasty Via *Piaohailu*

Chang-Won Choi*

Professor, Dept. of Chinese, Chungwoon University*

요 약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由《漂海錄》看明朝时期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同样，出发点也是这三个方面：明朝中国人的天人观，明朝中国人的人伦观以及明朝中国人的人生观。以这个角度作为切入点，以朝鲜官员崔溥所著的《漂海錄》作为主要史料依据进行简单的分析与研究。当今中国社会提倡一种主体思想，中国人称其为“和谐”，整个中国大陆社会正在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和谐社会”，即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营造气氛融洽的社会关系；人与自我的和谐相处，修身养德，提高国民自我素质。由此可以看出始终以“和谐”一词贯穿其中。

주제어 : 《漂海錄》, 人生观, 天人观, 人伦观, 人生观, 和谐观

Abstract Nowadays Chinese society advocates a kind of principal thinking, which Chinese call it "harmony". The entire Chinese society is trying to build a so-called "harmonious society", that is, people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arry 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ople live in harmony with others and build harmonious social relationships; people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mselves and cultivate self-morality and enhance national self-qualit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word "harmony" runs through this thinking all the time. This paper aims at viewing Chinese people's philosophy in Ming Dynasty from the *Piaohailu*. Likewise, the starting points of the paper are also these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people's relationships with nature, others and themselves. Based on this angle, it tries to conduct a simple analysis and study by taking Korean official Cui Pu's *Piaohailu* as the main historical data.

Key Words : "Piaohail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N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Oth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Themselves, Harmonious

一' 序言

社會的主体思想反映了一个國家的民族特点和性格，要了解和分析古代一个國家和民族的特性需要大量的史料，而鄰國如何看待中國的民族特性，又是一个嶄新的角

度。從史料的丰富程度和研究角度新穎等双重意義上看，作為中國見聞的長篇行記《漂海錄》¹⁾均称佳作。作者崔溥是500多年前朝鮮的官員，在明孝宗弘治元年（朝鮮成宗十九年，公元1488年）前往濟州島奔父喪，途中遭遇風暴，崔溥遂与同行者40余人漂流到中國浙江省，在今台州

Received 17 December 2015, Revised 24 December 2015
Accepted 31 December 2015
Corresponding Author: Chang-Won Choi
(Chungwoon University)
Email: cwchoi@chungwoon.ac.kr
ISSN: 2466-1139

© Industrial Promotion Institute.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is an open-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Non-Commercial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3.0>),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non-commercial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海岸登陸。一行人輾轉寧海、紹興等府縣抵杭州，再沿大運河揚帆北上，進入北京。盤桓二十余日，夏經三河、山海關、遼陽等處，渡過鴨綠江，抵達義州，平安歸國。崔溥一行在中國長途跋涉4000余公里，耳聞目睹了明朝弘治初年中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風情等各方面的情況，并奉王命詳細記述上奏而成篇。《漂海錄》文化內涵豐富，其記述的內容也是包羅萬象，可供取資的材料之多，認識中國、中國人之深，令人印象深刻。

本文以中國人與自然、他人、自我等三個角度為主軸線，對崔溥本人進入明朝之后的所見所聞進行分析和概括。也就所要討論的是由《漂海錄》看明代時期中國人的人生哲學，同樣，出發點也是這三個方面：明代中國人的天人觀、明朝中國人的人倫觀以及明朝中國人的人生觀。以這個角度作為切入口，以朝鮮官員崔溥所著的《漂海錄》作為主要史料依據進行簡單的分析和研究。

二、明代人的天人觀

古代中國，學人習慣于把自己與自然的關係稱為“天人觀”，縱觀中國歷史，先秦時代，中國人主要有三種“天人觀”：其一，老子主張“道法自然”的“順天說”，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即人類應該恪守見素抱朴，回歸自然；其二，荀子強調“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的思想，即利用自然，發揮人的作用；其三，《易經》基于陰陽之道，論述天人感應，天地人生生不息，厚德載物，主張天人和諧相處之說。漢儒董仲舒倡導“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明确了

“天人合一”的學說。宋儒朱熹依據“太極說”，將“天人合一”倫理化，強調“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朱子語類》卷十三）。至明代，朱子學的“天理說”據主流地位，形成宋明理學的龐大思想體系。其主要思想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首先，承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這也體現了古代中國人朴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其次，人有卓越的地位，與其他自然萬物又有所區別，不能簡單的等同。“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系辭上》），其意思就是人的作用非常大，大到什麼程度呢？人道可以與天道和地道相提并論。可見古代中國人把人的作用也看的很重，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最后，人又必須順從自然法則，自強不息，利用自然有所作為，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1. 大運河的政治、經濟效益表現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在崔溥的《漂海錄》中，記載的許多事與物都反映了中國人在處理人與自然關係中所遵循的“天人觀”。治水乃是明代中國人“天人合一”思想一個方面的體現。

崔溥自浙江台州登陸之后，一路行至杭州府，在杭州府停留幾日之后啓程，經京杭大運河北上京師，路途中詳細描寫了京杭大運河兩岸人文、經濟水文等現象。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到大運河的開鑿及使用似乎符合了荀子“制天命以用之”的思想。黃河、淮河、長江等大江大河大體為東西流向，中國人在隋代開鑿了京杭大運河，沿段修建水閘以提升水位，自南而北地將三大江河貫通起來。

這一巨大的水利工程，加強了北方政權對南方的控制，強化皇權，掌握南方經濟重心，加速北方與南方的經濟聯系，使得運河兩岸各城市一片欣欣向榮之貌。例如杭州府，書中是這樣描述的：“東南一都會，接屋成廊，連衽成帷，市積金銀，人擁錦綉。蠻檣海舶，櫛立街衢，酒帘歌樓，咫尺相望。”²⁾又如蘇州府“東瀕于海，控三江帶五湖，沃野千里，士夫淵藪，海陸珍寶，若紗羅綾緞，金銀珠玉，百工技藝，富商大賈，皆萃于此。”³⁾又例如在運河北段的臨清縣，“兩京要冲，商旅輻輳之地。其城中及城外數十里間，樓台之密、市肆之盛、貨財之富、船舶之集，雖不及蘇杭亦甲于山東，名于天下。”⁴⁾ 崔溥等人在

1) 作者崔溥（1454~1504），朝鮮李氏王朝官員，24歲時中進士第三名，29歲時獲中文科乙科第一名，1487年任朝鮮弘文館副校理（五品官員），奉王命赴濟州島執行公務。1488年閏正月初三，因其父去世喪喪回家，不幸遭風暴襲擊，而在海上漂流14天，在生命危急關頭，他們終於在“大唐國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界”（今三門縣）登陸。後來，崔溥自台州走陸路至杭州，由杭州沿京杭大運河水路至北京，再由北京走陸路至鴨綠江，返回自己的國家。崔溥在中國“旅行”了4個半月，行程4000余公里。回國后，他用漢文寫出了《漂海錄》一書，這部以日記體形式的著作共5万余字，涉及明朝弘治初年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風情等方面的情況，是研究中國明朝海防、政制、司法、運河、城市、地志、民俗的重要文獻。

2) 서인범·주성지 譯，《漂海錄》卷二，二月十二日，頁580。

3) 서인범·주성지 譯，《漂海錄》卷二，二月十七日，頁582-583。

出臨清縣之時還遇見了陳圮等七名來自遼東的商人。

由此可見，明朝時期京師至江南運河兩岸經濟十分繁榮，運河的經濟作用十分重要，堪稱明時水上經濟大動脈。這些種種迹象似乎都在印証前文所提到的荀子提出的觀點。

2. “順水性”疏通河道繼承了中國人自古以來的治水思想⁴

弘治元年三月初六日，過沛縣之時，與崔溥同行的傅榮曾經對崔溥說過這樣一段話：“足下觀我大國制度，以謂如何，自江南抵北都，旧无河路，自至正年間來，始為通路之計，至我太宗朝。置平江侯以治之，疏清源，濬濟沛，鑿淮陰，以達于大江，一帶脈絡，万里通津，舟楫攸濟，功保万全，民受其賜，万世永賴。”⁵ 再看《漂海錄》卷二，三月初五日描述明人治水之法：“洪惟我朝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寰宇，乃建都南京以臨天下。暨我太宗文皇帝紹基鴻業，遷都北京。于時，方岳諸鎮及四夷朝聘貢賦，每歲咸會于畿內。而滇蜀、荆楚、甌越、閩浙，悉由揚子江泛東海，沿流北入天津，渡潞河詣京師。

其江海之闊，風波之險，京儲轉輸為難。故我太宗文皇帝慮東南海運之艱，乃召股肱大臣往徐、揚、淮、濟，度地勢，順水性。東自瓜洲，西自儀真，咸作壩以截之，俾不泄于江。仍因近世旧規，鑿漕引水為河，而總會于揚，由揚到淮，由淮至徐，由徐至濟。自濟以南，則水勢南下，接黃河會入海；自濟以北，則水勢北流，接衛河會白河亦入于海。上夏以地形南北高下不一，分泄水勢无以貯蓄、非經久計，仍命有司置閘，或五、七里一閘，或十數里一閘，濬水濟舟，迄今淵源不竭。自是方岳蕃鎮與夫四夷朝聘會同，及軍民貢賦轉輸、商賈貿易，皆由于斯，而舟楫之利始通乎天下，以濟万民无夏江海風濤之厄，我太宗是作實續禹之功，補補天之不足，開万世太平之盛典也。徐乃古彭城東方大郡，襟淮帶濟，為南北兩京喉舌。徐之北，黃家村之東，有山溪一派，南流入閘，水勢洶涌多伏流。走沙壅塞淤淺，舟楫經此恒為阻隘，民甚病焉。天順戊寅春，有司具疏聞于朝，我英宗睿皇帝不繼洪休，益篤前烈，乃召有司立閘以通之，設官以理之。自是舟楫往來无夏前患。”⁶

這兩段話記載江南抵北都，旧无河路，明朝人在原先運河基础上疏通河道，聯接長江、淮河、黃河、錢塘江等几大流域，古代中國人在水利工程的修筑上遵守因勢導之的原則，明太宗在召喚大臣之時也囑咐他們必須度地勢，順水性，這與現在以阻塞建壩防洪有鮮明區別，文中關於治水的用詞也多次使用“疏”，“濬”等詞，河道的疏通對明朝的經濟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在運河河道疏浚的前提下，才會出現文中所記載的南北方各城市的繁榮景象，而河道的治理前提條件則又是古代中國人遵從自然法則順應自然，在此的表現則是度地勢、順水性。又如文中未提到的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同樣亦是古中國人遵循自然規律、利用自然規律所帶來的福祉的著名工程。這也正式體現了中國人在治理水文方面遵循“天人合一”之思想。首先必須遵從自然規律，其次利用自然造福于民。此主体思想在文中也體現的淋漓盡致。

3. 精神世界秉承了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⁷

在明朝時期，中國人同樣也崇拜神明，包括道教以及佛教，此時佛教在中國傳播已極盛，對神明的崇拜亦是對自然崇拜的一種表現。崔溥在記象旅程的過程中，常常提到經過諸多廟宇（沿河而東而北，過夏國公神道廟、觀音堂、懷遠將軍蘭公之堂、晏公廟、黃巾壩、北來寺、竹溪亭鋪…⁷）。崔溥等人行至開河驛龍王廟時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楊旺与其徒入廟中，焚香礼神以祭，令臣等亦拜。”“陳瑄曰：‘此祠，乃龍王祠也，有灵跡。故過此者皆致恭拜祭，然后行，不然則必有風濤之險。’”⁸在當時由于科技的發展水平限制，中國人對於自然現象也怀揣一種崇拜之情。文中所提到的“龍王”為水神，中國人相信龍王對河流、雨水，海洋的控制有決定作用，此舉正是中國人所謂“順天命”之體現！尊崇自然而后乃行，運用自然之規律，有所作為，此乃“天人合一”說之精華所在。

崔溥等人入明之際，正是明成化二十三年，明憲宗朱見深在位時期，期間明朝崇佛之風極盛，《漂海錄》中同樣也記載了許多佛教寺廟的情況。這是個奇特的現象，佛教本不是中國本土宗教，兩漢交替之際東傳并經魏晉南北朝而成為漢傳大乘佛教，在中國生根成長，勢力極為盛大。“就以適應環境而言，佛教基本上也是強調改變自己去遷就環境。”⁹而在明朝，皇帝對佛教的尊崇，也在一

4) 서인범·주성지 譯,《漂海錄》卷二,三月十四日,頁597.

5) 서인범·주성지 譯,《漂海錄》卷二,三月初六日,頁593.

6) 서인범·주성지 譯,《漂海錄》卷二,三月初五日,頁592.

7) 葛振家 著,崔溥《飄海錄》評注 卷二,二月二十三日,頁114.

8) 서인범·주성지 譯,《漂海錄》卷二,三月初十日,頁595.

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佛教的發展，如文中所述：大行皇帝（明憲宗）尊崇佛法，巨剎半于天下，方袍多于編戶，僧等安臥飽食以修釋行。¹⁰⁾佛教文化這種特點與中國人的天人和諧之思想正好不謀而合，這也就是為何佛教能在中國傳播如此之盛的原因。自然與環境，人類必須順應，這就是中國人的觀點。

三 明代人的人倫觀

中國經歷了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央集權的體制和意識根深蒂固。中國人習慣於把地位高的人權威化，在人際關係和社會意識取向方面，非常強調權威性。中國人習慣於把地位高的人權威化，“這種做法主要是為了鞏固上下的關係，便于維系團體內部的和諧，以達到穩定社會的最終目的。”¹¹⁾

再者，為了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中國人往往把社會習俗同樣也以權威化，制度化。按照即成的社會習俗辦事，各司其職，對於維持現有的社會關係有一定好處，一旦有人不按照常理處事，其他人必以之為異，且為了維護即成的習俗，其他人必將要求此人保持行為一致，趨于大同。

古代中國等級觀念十分強烈，在《漂海錄》中有許多記載也體現了這一點。本文選取其中幾個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據此觀察古代中國人的這些性格特徵。

其例一，正月二十四日，崔溥等人行至健跳所，遇丙午年登科的張輔，與之討論朝鮮科舉等級分科等事。后張輔“引臣至其家。則其家前街果以雕龍石柱，作二層三間之門，金碧眩曜，其上大書丙午科張輔之家之標。輔蓋以己之登第誇示臣。臣亦以浮誕之言誇之曰：‘我再中科第，歲受米三百石，旌門三層，足下其不及于我矣。’輔曰：‘何以知之？’臣曰：‘我之旌門，遠莫致之，我有文科重試小錄在此。’即拔示之，輔于錄中，見臣職姓名，下跪曰：‘我殆不及矣。’”¹²⁾

其例二，崔溥等人行至德州時所記敘的情況：“大上皇

帝同母弟有賢德，封魯地，號魯王，在此德州境三百余里之地，故時人成為德王。臣曰：‘德王何以不在京師，在外方乎。’榮曰：‘親王在內，恐有他意，故待年十六歲以上者皆封為王，出之于外。’臣曰：‘德王在撒謊。你懂所轄腹里之地，亦自擅号令政事乎？’榮曰：‘王府各司之官掌諸政，有教授之官，有護衛之官，王與之講詩書閱射御而已，号令政事，王不得有為。一出于朝廷。’”¹³⁾前者又對各品官員衣飾着裝作了詳細記載，各級官員着裝配飾等級分明，一目了然。

其例三，崔溥等人過滄州府時，恰遇當地祭孔之典，其文記載如下：“躬幸國之監。釋奠先聖，崇儒重道之意亦至矣。臣戲之曰：天子亦拜于列國之臣乎。榮曰：孔子，萬世之師，豈以人臣之禮待之乎，但天子當釋奠時，贊禮官曰：鞠躬拜，天子欲拜，傍又有一贊禮官曰：孔子曾為魯司寇。贊禮官又唱曰：平身，禮當拜而實不拜。此先師尊天子之禮，兩不悖也。”¹⁴⁾

其例四，崔溥入京拜見大明皇帝之時，身着素服，以從朱文公家禮。但是按照明朝禮制，即使是守孝之禮，也不可廢天子禮儀。禮部官員曾明確告訴崔溥：“今日我與禮部尚書大人已議之。當是時，親喪輕天恩重，拜謝之理，不可廢見。”¹⁵⁾最后崔溥迫于天子禮儀不得不換下素服，着吉服入朝拜謝皇帝。

現在來分析上述事例。首先，事例一崔溥所遇丙午年登科的張輔本是在客人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功名，但是當崔溥報出自己的官位以及科舉榜次之時，其人立刻向崔溥跪拜并表示自己佩服之情以及始料不及之意。可見中國人習慣於服從權威化的人或事，與其他人交流接觸之時，習慣於以年齡、地位、官職等資質來選擇處世態度，對待什麼樣的人說什麼樣的話，對比自己地位高層次之人士顯示出謙恭之態。用此關係來維持中國封建社會關係的相對和諧和穩定。

其次，第三段描述的祭孔場面與第四段崔溥入朝受賞謝恩關於更換吉服之事又顯示中國人另一種處世心理特點。正如崔溥所言，孔子原本只是魯國司寇，到今却受帝王之禮，各朝帝王皆來拜孔聖人。崔溥雖崇儒術，但見此狀也不禁感到驚訝。對此，中國人早已經適應這種社會現象，已經把祭孔作為一種社會習俗權威化，所以會出現文

9) 文崇一、蕭新煌主編，《中國人：觀念與行為》，台北，巨流圖書公司印行，1989，第14頁。

10) 葛振家著 崔溥《漂海錄》評注 卷二，四月二十四日，頁183。

11) 文崇一、蕭新煌主編，《中國人：觀念與行為》，台北，巨流圖書公司印行，1989，第18頁。

12) 서인범·주성지 譯，《漂海錄》卷一，正月二十四日，頁566-567。

13) 서인범·주성지 譯，《漂海錄》卷二，三月十八日，頁598。

14) 서인범·주성지 譯，《漂海錄》卷二，三月初八日，頁593-594。

15) 서인범·주성지 譯，《漂海錄》卷二，三月二十一日，頁599-600。

中傅榮與崔溥關於祭孔之爭。文中記道：臣曰：“孔子之道大於天地，明於日月，信於四時，達之天下外代而無窮。……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當事以先聖先師之禮，又何舉魯司寇之稱當拜而不拜乎？若舉司寇以稱孔子，則孔子是一小國陪臣，又安可屈天子之尊以祀之乎？”榮（傅榮）嘿然。¹⁶ 雖質疑于此，明官員或因崔溥之言正是自己的心理話，所以僅是嘿然一笑。又如受皇帝賞賜之事，崔溥一再堅持着素服入朝謝恩，但是明朝禮部官員則始終堅持要求崔溥着吉服入朝，可見皇帝之權威。在這種權威化的習俗和其他官員同化性的要求，崔溥只好接受。但是禮部在考慮到崔溥為外國官員身份的特殊情況，同意受賞之時可由其侍從代為領取。此事反映中國人因時、因人、因地制宜之原則，強調反求諸己而不外責，處事態度有很大的圓融性。

最後，那就是皇權的高度集中。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廢丞相制，中央集權達到新的高度。後又歷靖難之役，朱棣大肆剪除異己，推行削藩，進一步高度集權。但朱棣之後的明朝諸帝往往不理朝政，宦官權力漸重，以至後來宦官狂悖之甚。這個獨特的政治現象，崔溥捕捉描寫得很細緻，反映出崔溥敏感的政治嗅覺。崔溥過魯橋驛時，“見有太監劉姓者封王赴京，其旌旗甲冑，鼓樓管弦之盛，震蕩江河，及是闌，劉以彈丸亂射舟人，其狂悖如此。陳瑄曰：‘此舟中內官，如此至為。’傅榮問諸臣曰：‘貴處亦有此太監否？’臣曰：‘我國內官，只在宮中遷掃傳命之役，不任以官事。’榮曰：‘太上皇帝信任宦官，故若此。刑余人，持重權為近侍，文武官皆趨附之。’”¹⁷

這是個特殊的現象，說明中國人在處理自己人內部關係時，往往猜忌心重，而更愿意使利益或者權力分散，而自己本人却掌握分配權力的主動權。處事方式極為圓融，在保持表面的人際關係和諧之前提條件下不動聲色以達到自己的實際目的，這種心理特點實在微妙。

四 明代人的人生觀

人類很早就開始思考自我為何許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問題了。這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如何認識自己，而又如何把自己，每

個國家的人都會有自己的特點。《漂海錄》一文記載中國人的心理描述較少，本文就其他方面簡單分析一下中國人與自我認識。

明朝中國人主張內心的修養，以及積德行善，達到一個較高的精神境界。其所有如此，首先是因為明代以朱子學為官學，教化人心的經典和科學考試題庫。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欽定朱熹的《四書五經》、《大學衍義》，昭告天下這些著作為科學命題的出典，天下學子莫不苦學之，宋儒理學由此浸潤社會精英頭腦。永樂七年（1409年）成祖朱棣親自撰成《聖學心法》四卷。明永樂十二年（1414年），再修《四書五經大全》，朱棣親自作序，頒行於天下。至明代宗朱祁鈺臨朝（景泰元年即1450年），將朱子與孔子並列，享春秋兩大祀，朱熹和朱子學地位顯赫，歷代朱家子孫皆享國家俸祿的殊榮。在明代，朱子學說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八條目，成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的規範，¹⁸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在《漂海錄》中，從台州桃渚所的武官備倭指揮劉澤訊問崔溥一行人“所讀詩書、尊崇何典，衣冠禮樂，從何代之制”開始，¹⁹到杭州府按察提調學校副使鄭大人詢問“科目之制”、“文章体格”、“治何經”，要求解釋經書，²⁰以及明帝派出的織染羅太監御史三大人到蘇州府錫山驛船上，與崔溥晤談，稱贊他是“禮義國好人”，也提出“你國尊何經”、“也有學校否”、“尊崇古昔何神聖”等問題，²¹請崔溥答復等，可見，明朝官宦十分急欲了解并看重海東朱子學的現狀。由此，不難想見在明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其次，是因為佛教在明時傳播甚廣，社會影響廣泛。本文前部分也有提到。《漂海錄》中也多處描述佛教寺廟眾多。其中有這樣的描寫：“大行皇帝之崇佛如是，寺刹僧佛之盛又如是。”佛教的中心思想簡單的說來可以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幾個字來概括。而這正符合了中國人對於自身修養的一種提升要求。中國人相信“因果報應”一說，所以希望通過對自身修養的提升來達到人生境界的升華。崔溥等人在玉河館時，明朝官員王能來訪，交談中提及崔溥海上漂流之事時有這樣的描述：“聞你從者有無

18) 《四書集注·大學章句》

19)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漂海錄》 卷一, 閏正月二十一日, 頁563-564.

20)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漂海錄》 卷二, 二月初七日, 頁574-575.

21)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漂海錄》 卷二, 二月十八日, 頁584-585.

16) 葛振家 著 崔溥《飄海錄》評注 卷二, 三月二十一日, 頁138.
17)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漂海錄》 卷三, 四月十九日, 頁608-609.

之夫，然乎？’臣曰：‘然。’能曰：‘得非幸乎？蓋人口而為日多，則難平居無事，聞有患死者，况遭被惡風，過盡大海，一亡亡者。千古所稀，想必你于平昔積善所致也。’²²⁾王能見崔溥所行之人經海難之后全部保全，大為驚嘆，但他並沒有稱贊崔溥領導之才，而歸功於其“平昔積善所致也”。善有善果，中國人“因果報應”之思想由此可見一斑。

第二點，中國人對於自己嚴格要求，明朝官員秉公辦案和注重調研的精神非常明顯。明孝宗弘治年間，一方面是政治清明，較少弊政，中央至地方的各級官僚機構運轉有效率。另一方面，此事也是倭寇襲擾東南沿海的猖獗之時。因此，崔溥自牛頭頭海登陸之后，備受官員檢查。江浙一帶海防警備森嚴，當地民衆的海防意識也極高，崔溥等人初登岸被疑是倭寇之時，有僧人告知：“此乃桃渚所千戶也，聞倭人犯境，領器械以備于此。因許千戶之報，率兵往驅你輩以來。”²³⁾這也側面反映了中國人的憂患意識。在辨別崔溥身份這件事情上，文中也作了比較細緻的記載，初遇把總關，把總關從各方位考察崔溥等人之言行、物品，并作文書上報上級；到紹興府時，又遇布政三司審問，讓崔溥寫出朝鮮國歷代沿革、都邑、山川、人物、尚俗等等情況，并詳細盤問朝鮮政治、軍事、教育制度，由此可見明朝官員處事謹慎態度。

最后，絕大多數中國人在善鄰意識方面具有很强的集體認同感。崔溥一行43人在由海而陸，從南到北的8000余里的長途跋涉中，除去在海島遭遇海盜的侵襲之外，登陸后人身安全具有保障。在確認朝鮮吏崔溥之身份后，沿途各級官員皆以盛情款待之。在北京玉河館時，崔溥几乎每天都要接待鴻臚寺主簿、職方清吏司郎中、會同館副使、禮部吏、錦衣校尉、國子監生員等各式人物的拜訪。崔溥本人也十分感嘆明朝人對待日本人和對待朝鮮人的態度差別。離開北京時，由百戶張述祖一路護送至遼東。崔溥在《漂海錄》中記載：“今我等到皇都，皇帝有賞賜。到广宁，鎮守三司賜衣裳帽革，軍人空手而來，重負而還，此三幸也，凡此三幸，莫知其所致也。”²⁴⁾中國人善待鄰國落難之人的古道熱腸令人感動。待崔溥歸國之時，所受沿途各官員以及鄉紳所贈物品盡然有十五馱之多。

五. 结语

此書有文化交價值。十五世紀的朝鮮半島王朝與明王朝，文化一定的差異。此書將兩種文化進行了對比。強調的更多共性，反映了那個時代東亞文化圈的共同心理。當然，崔溥之《漂海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在對於研究明朝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價值。本文從社會人文角度，節選《漂海錄》中的幾段代表性記述，簡單分析中國人在看待自己與自然、他人和自己這三者的關係，透過崔溥一名朝鮮官吏的視角客觀看待中國人的人生哲學。

在與自然方面，“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尊崇自然但順應自然法則使中國人在水利等方面得到最直接的益處。在與他人的關係方面，古代中國人則強調權威性的人物以及遵循社會固有習俗，以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因人、因時、因地制宜地處理人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在與自身的關係上，中國人主張內心的道德修養以提升自我的人生境界，做事謹慎，有較強的憂患意識，並且有較強的集體認同感。明代中國人的人生哲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兩千多年來東亞文化圈居民的共同的人生哲學。在世界科技飛速發展，東亞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這些的理念仍然是東方社會寶貴的精神財富。

参考文献

- [1] 박원호, 《최부표해록연구》, 서울, 고려대학교출판부, 2006.
- [2] 高柄翊, 成宗時期崔溥之漂流及其《漂海錄》, 《李相伯博士回甲紀念論叢》, 首爾, 乙酉文化社, 1964.
- [3] 宋成有·崔昌源, 從《漂海錄》看崔溥的中國觀, 서울, 中國語文論譯叢刊第30輯, 2012.
- [4] 최소자외2, 《18世紀燕行錄與中國社會》, 首爾, 圖書出版慧眼, 2007.
- [5] 김현미, 《18世紀燕行錄的展開與特性》, 梨花研究叢書4, 首爾, 圖書出版慧眼, 2007.
- [6] 林基甘編, 《燕行錄全集》第一冊, 서울, 東國大學出版部, 2001.
- [7] 서인범·주성지, 최부 《漂海錄》, 서울, 도서출판한길사, 2010.
- [8] 허경진, 《漂海錄》體現的朝中兩國人的相互認識, 中

22)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漂海錄》卷三, 四月十日, 頁606.

23) 葛振家 著 崔溥《飄海錄》評注 卷一, 閏正月十八日, 頁57.

24) 서인범·주성지 譯, 《漂海錄》卷三, 五月十九日, 頁598-599.

- 國研究第48卷, 서울,韓國外國語大學校,中國問題研究所, 2010.
- [9] 김장녀, 최부의 漂海錄을 통해 본 15세기 朝鮮과 明朝 文化交流의 現場, 《고전과 해석》 제 3집, 서울,고전한문학회, 2001.
- [10] 文崇一, 蕭新煌.《中國人:觀念与行爲》,台北,巨流圖書公司印行.1989.
- [11] 葛振家,《飄海錄》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 [12] 馮之浚,《中華精神与和諧社會》,北京,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科技期刊, 2007.
- [13] 李亦園,《文化的圖象(上)》,台北,允晨叢刊37, 1992.
- [14] 李亦園,《人類學与現代社會》,台北,水牛出版社, 1992.
- [15] 李亦園,《信仰与文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1985.
- [16] 鄭德坤,《中國文化人類學》,台北,漢聲出版社, 1974.
- [17] 徐東日,《朝鮮朝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爲中心,中華書局, 2010.
- [18] 楊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關係》,上海辭書出版社,上海, 2011.
- [19] 葛振家,《崔溥<飄海錄>評注》,線裝書局, 2002.

최 창 원(Choi, Chang Won)



- 국립대만대학 사회학 박사(중국 문화학)
- 國立臺灣大學 / 社會學 博士 (專攻: 中國 文化學)
- 현재 : 청운대학교 중국학과 교수
- 관심분야 : 중국문화학
- E-Mail : cwchoi@chungwoon.ac.kr